

以色列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 右倾嬗变及其影响*

吴诗尧

内容提要 以色列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寓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之中，是促成以色列建国与存续的关键思潮，也是中东地区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由于受到理论实践环境变迁、所属政党类型特征、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特质等因素共同驱动，这一思潮呈现出右倾嬗变趋势，并由此具体区分为建设性社会主义、左翼价值观、社会民主主义等不同发展阶段。究其根源，以色列工党社会主义观的修正和改良导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目标追求和实践路径相应改变，进而致使该思潮所蕴含的左、右翼元素此消彼长，意识形态光谱位置持续向右偏移。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和以色列建国初期，以色列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曾经是用以指导当地社会建构与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以色列工党用以壮大社会基础、塑造社会共识的思想法宝之一。而在此之后，这一思潮的右倾嬗变进一步广泛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以色列的政坛格局、社会面貌以及国家发展和治理模式。特别是近年来，这一思想的右倾幅度加剧，客观上推动以色列社会呈现结构性右倾，并对以色列工党的政坛发展产生了复杂影响。

关键词 政党政治 以色列工党 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党

作者简介 吴诗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以色列工党（Israeli Labor Party，以下简称“工党”）是以色列的建国和立国政党，也是中东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民主党。1930年，劳工团结党

* 本文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QD20）的资助。感谢本文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

(Labor Unity) 与青年工人党 (The Young Worker) 合并, 组建起名为巴勒斯坦工人党 (Workers' Party of the Land of Israel, 亦即以色列地工人党) 的新政党。1931 年, 该党以巨大优势赢下巴勒斯坦地区犹太政治权力机构选举, 由此开始领导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Zionism, 以下简称“复国运动”)。在其领导下, 复国运动于 1948 年实现最终突破, 以色列宣布建国。1968 年, 该党正式更名为以色列工党。^① 结合复国运动和以色列的具体现实, 工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目标和实践途径采取灵活动态理解, 并加以本土化改造, 由此形成了高度犹太化、以色列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② 它是工党的指导思想劳工犹太复国主义 (Labor Zionism) 的方法论基础, 为工党领导复国运动、进行国家治理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解析和实践指导, 从而使以色列得以建国并且存续。^③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理念依循和具体内涵上保持动态, 由此呈现右倾嬗变。这种嬗变勾勒出工党的理念流变和政坛起伏, 折射出理论实践环境的巨大变迁, 更深刻影响了当今

① 为便于论述, 本文将以色列工党及其前身巴勒斯坦工人党统一简称为“工党”。1951 年社会党国际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成立时, 工党便加入了这一组织。前工党党首西蒙·佩雷斯 (Shimon Peres) 还曾在社会党国际中担任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务。2018 年, 由于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旨在支持巴勒斯坦的针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决议, 工党宣布退出该组织。目前, 工党是另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及进步主义政党国际组织进步联盟 (Progressive Alliance) 的成员, 同时也是欧洲社会党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的观察员。关于工党的组织发展与延承以及早期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思想、实践和组织状况, See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From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pp. 295 - 319; Amos Perlmutter, “Berl Katznelson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vism”,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 No. 1, 1977, pp. 71 - 89; Colin Sc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0 - 37.

② 本文中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指代的是传统意义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理解, 即德文中“*Sozialdemokratie*”或者英语中“*Social Democracy*”单词所指代的意涵, 而并未采取德国学者托马斯·迈尔 (Thomas Meyer) 等主张的“社会的民主主义” (*Soziale Demokratie*) 的理解。关于两者意涵的具体区别, 可以参见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上) ——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演变》, 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 年第 3 期, 第 3 ~ 21 页; 王学东:《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 年第 3 期, 第 39 ~ 40 页; [德国] 托马斯·迈尔等编:《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 殷叙彝、张世鹏编译, 重庆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 ~ 5 页、第 27 ~ 31 页和第 236 页。

③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是由犹太复国主义、劳工学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等共同组成的意识形态学说体系, 其基本主张是通过犹太劳工的生产和建设, 在巴勒斯坦地区建成一个先进的现代犹太国家。它是以色列工党的指导思想。See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From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pp. 255 - 338; Zeev Stern, *The Founding Myth of Israel: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Jewish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 - 46.

以色列的政坛格局和社会面貌，是形塑该国政党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要素之一。

作为以色列的立国政党和中东地区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工党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既有研究主要从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演化、治理模式与效能、特有社会组织等角度，探讨了工党的政坛表现、思想嬗变以及治理实践，从而围绕这一政党形成了丰富且立体的学理把握。^①其中，不少研究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构成要素的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投以关注，对其内涵、变化、实践成效等予以分析讨论。^②比如，有研究者指出，尽管工党在以色列立国过程中发挥出巨大作用，但由于该党当时迫切需要遏止政坛地位下滑，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重大变化。^③同时，也不乏研究者从社会主义分野、社会民主党政治实践与组织演

① 参见刘靖华：《论中东和平与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矛盾》，载《西亚非洲》1987年第5期，第43~53页；徐鹤鸣：《以色列工党简介》，载《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70~74页；丁隆：《以色列：继续“向右转”》，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3期，第50~51页；杨阳：《以色列的后锡安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8期，第32~37页；王彦敏：《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多维考察》，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6期，第44~56页；吴诗尧：《以色列工党政坛走势的分析与前瞻》，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1期，第128~140页；艾仁贵：《一个还是多个：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4期，第51~80页；王晋：《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与贝内特政府的政策调整》，载《当代世界》2022年第3期，第51~55页；Mitchell Cohen, “Labor Zionism, the State, and Beyond: An Interpretation of Changing Realities and Changing Histories”, *Israel Studies Review*, Vol. 30, No. 2, 2015, pp. 1 - 27; Udi Lebel and Guy Hatuka, “De - militarization as Political Self - marginalization: Israeli Labor Party and the Members of Israeli Security Elites, 1977 - 2015”, *Israel Affairs*, Vol. 22, No. 3 - 4, 2016, pp. 641 - 663; Neil Rogachevsky, “The Not - So - Strange Death of Israel’s Labor Party”, *American Affairs*, Vol. 4, No. 2, 2020, pp. 168 - 181; Avi Shilon,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Wing in Israel: Yossi Beili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eace Progress*, London: I. B. Tauris, 2020, pp. 226 - 264.

② 参见肖宪：《以色列的基布兹》，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2期，第65~70页；李绍先：《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公社”——以色列基布兹见闻》，载《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9期，第42页、第48~49页；高放：《以色列“基布兹”的奇迹》，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3期，第122~127页；崔守军、钟晓萍：《以色列基布兹变革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第107~116页；丛日云、马涛：《对以色列基布兹模式的历史考察及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2期，第67~75页；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London: The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1997, pp. 262 - 265, 314 - 361; Ran Abramitzky, *The Mystery of the Kibbutz: Egalitarian Principles in a Capital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79 - 104, 181 - 249; Yaffa Moskovich, “Loss of Democracy in a Cooperative Kibbutz Industry: Ethical Dilemmas - An Israeli Cas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Vol. 41, No. 7/8, 2021, pp. 909 - 929.

③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pp. 275 - 276.

化的视角，对工党及其理念学说加以考察。^① 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工党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既有研究主要是透过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来理解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而相对缺乏针对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学说本身的系统分析。同时，考虑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是中东地区富有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围绕这一学说的基于左翼思潮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视角的学理考察和分析还有待推进。鉴此，本文聚焦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学说本身，综合运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演化和以色列社会变迁两重视角，探察其右倾嬗变的轨迹、实质、动因以及重大现实影响，以此增进学界对于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理认知，并且丰富关于以色列政党政治、社会动向以及中东地区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研究主题的多维度理解。

一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是关于运用社会主义及其理念和价值来促进现代犹太国家建立、发展和治理的意识形态学说，其基本主张在于以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工具和实践指导，推动复国运动和现代犹太国家的发展。^② 在理

^① 参见王彦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探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第46~48页；林建：《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细胞”——以色列“基布兹”的组织形式、发展原因及其启示》，载《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第121~124页；王彦敏：《以色列建国前劳工派实力地位的历史演变》，载《理论学刊》2013年第12期，第96~100页；冯焱：《犹太复国主义实践进程中的共产主义运动》，载《外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62~69页；易小明：《当前中东左翼政党的地区性交流与合作：主要特征及其评价》，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2期，第123~131页；杨兴：《中东地区主要社会党：现状与展望》，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3期，第135~146页；Mitchell Cohen, *Zion and State: Nation, Clas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Isra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85 - 133; Zeev Stern, *The Founding Myth of Israel: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Jewish State*, pp. 134 - 177, 217 - 243; A. Atmaca, "Roots of Labor Zionism: Israel as the New Land of Socialist Ideas?", *Ortadoğu Etitleri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 No. 1, 2012, pp. 165 - 191; Philip Mendes, *Jews and the Lef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olitical Allia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96 - 126; Orkibi Eithan, "'It's a War on Israel Liberal Democracy': The Israeli Left as a Moral Panic Community, 2015 - 19", *Israel Affairs*, Vol. 28, No. 6, 2022, pp. 878 - 895.

^② 也正因此，工党在以色列又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党”，其秉持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也被称作“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Socialist Zionism）。See Jewish Virtual Library, "Zionism: Socialist/Labor Zionism",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socialist-zionism>, 2023-06-25.

论发展过程中，该思潮凸显右倾嬗变，即工党对社会主义采取修正改良式理解，导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目标追求和实践思路相应改变，进而致使该思潮所蕴含的左翼元素减少而右翼元素增加，意识形态光谱位置逐渐向右偏移。在此过程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怎样？如何在建立建设现代犹太国家的过程中应用和践行社会主义？这是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着力思考的 3 个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动态化的理解，使得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理念依循和具体内容上也保持动态，从而使该思潮的右倾嬗变划分为以下 3 个发展阶段。

（一）建设性社会主义（Constructive Socialism）阶段（1930~1977 年）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肇兴于工党理论家贝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znelson）所创立的建设性社会主义学说。该学说在思辨、批判既有的运用社会主义来解读和指导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理路的基础上，围绕“如何使复国运动取得成功”“怎样建设现代犹太国家”这两大工党的核心关切，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在 1930 年至 1977 年工党连续主导复国运动和以色列政坛期间^①，建设性社会主义作为该党用以指导政策和实践的重要理论工具，构成了这一时期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

从理论的生成路径看，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完全从“零基础”建构而来，而是在思辨、批判伯尔·博罗霍夫（Ber Borochov）等关于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来解析“犹太人问题”（Jewish Question）、指导复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Marxist Zionism）等思想学说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学说。这样的生成路径给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奠定了深刻、鲜明的左翼理论底蕴，也开启了工党运用社会主义学说和理念来分析、论证并指导复国运动的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既有学说的影响^②，但工党的

^① 以色列建国前，代表议会（Assembly of Representatives）被认为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会的准权力机构。自 1931 年起，工党一直拥有代表议会的最多议席，牢牢掌握其主导权，并由此领导复国运动。以色列建国后，代表议会发展成为以色列国家议会克奈赛特（Knesset）。而作为建国政党，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连战连捷，于 1948 年至 1977 年间连续执政。换言之，成立之后直至 1977 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工党事实上连续主宰了当地的政治生活。Shlomo Avineri, “The Origins and Challenges of Israeli Democracy”, *Haaretz*, October 3, 2014.

^② 关于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相关学说的批判、借鉴与超越，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多重影响。See Zachary Lockman, “The Left in Israel: Zionism vs. Socialism”, *MERIP Reports*, No. 49, 1976, pp. 3–18; Mitchell Cohen, *Zion and State: Nation, Clas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Israel*, pp. 90–102; Colin Sc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pp. 16–36.

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开始便凸显出与这些学说的显著差异，也因此而更加契合于复国运动的实践环境和现实需要。特别是不同于既有学说完全采用了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的社会主义观^①，建设性社会主义从推动复国运动发展这一根本实际出发，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复国运动化的理解，并在其中强调运用左翼的理念、价值和思路来塑造复国运动实践。

就内容而言，一则，建设性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内涵凝练为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要素，并且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目标抽象简化为“纠正社会的不公与罪恶”。^② 另则，建设性社会主义尝试解构基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路径^③，并以强调价值创造的“革命性建设主义”概念来重构“革命”意涵^④，从而变更了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实践途径的理解，即主张只有依靠工农业生产建设，才能真正践行社会主义。由此，持有建设性社会主义的工党主张通过犹太劳工的“革命性建设”来迅速提升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会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推动复国运动发展，最终在当地建成一个彰显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的先进犹太国家。^⑤ 基于这一理解，在主导政坛期间，工党注重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国民经济，强力推动工农业生产建设。例如，在1969年竞选纲领中，工党就明确提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国家干预颇为必要”。^⑥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以色列官方在20世纪70年代连续出版的“国情手册”（Facts About Israel）中，也指出“（工党）政府通过计划

① 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强调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来论证、分析并指导犹太复国主义和复国运动，主张复国运动必须先建立犹太国家，破除犹太人所遭受的生产条件限制，再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来推动在犹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提高该国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水平，由此彻底消灭导致犹太人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根除犹太人问题。在分析过程中，该学说大量援引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逻辑和概念，并且还构造出“生产条件”（conditions of production）等尝试嫁接科学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新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主张者人数很少，不代表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观点。Mitchell Cohen ed., *Class Struggle and the Jewish Nation: Selected Essays in Marxist Zionism*, pp. 50 - 168. Arthur Hertzberg ed., *The Zionist Idea: 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ader*, pp. 331 - 355.

② Berl Katznelson, *Socialist Zionism: Neglected Values* (in Hebrew), Tel Aviv: Am Oved, 1941, pp. 25 - 27, in Zeev Stern, *The Founding Myth of Israel: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Jewish State*, p. 155.

③ Berl Katznelson,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Arthur Hertzberg ed., *The Zionist Idea: 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ader*, p. 391.

④ Berl Katznelson,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p. 392.

⑤ Gideon Shimoni, *The Zionist Ideology*,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98 - 201.

⑥ Israeli Labor Party, “The Platform for 1969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 <https://en.idi.org.il/israeli-elections-and-parties/parties/alignment>, 2023 - 06 - 25.

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①

由此可见，在建设性社会主义阶段，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批判既有相关学说的社会主义观的基础上，围绕复国运动的现实需要，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赋予了新的理解，并且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这表明，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开始便对社会主义采取了修正改良式的理解。这样的理解一方面使得这一阶段的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涵括了丰富的左翼元素，而另一方面则制约了工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实践与追求，导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联系和互动难以进一步深入。

（二）左翼价值观阶段（1977 ~ 2009 年）

工党在 1977 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被利库德集团（Likud）击败，首次下野。面对右翼政党崛起和以色列政局“变天”，工党提炼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既有内容与理念，形成同右翼政党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左翼价值观，用以指引治理逻辑和政策思路，凝聚选民支持。

虽然名称凸显左翼属性，但由于工党继续修正其社会主义观，并且就左翼价值采取了务实化、议题化的狭义理解，因此在左翼价值观阶段，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左翼色彩较前一阶段趋于淡化。左翼价值观主要包括社会平等和正义、集体主义、强力政府等理念和价值，具体表现为工党关于犹太国家发展和治理的政策思考及实践。其中，工党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平等与正义，并由此强调要保障并促进民众权益，防止社会资源分配不均。^② 工党对这两项价值的践行主要诉诸经济和民生政策，并借助犹太总工会（后更名为“以色列总工会”）^③ 等机构来对资源、就业机会和财富施

^① Misha Louvish, Mordekhai Nurock eds., *Facts about Israel*, 1975, Jerusalem: Information Division of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76, p. 106.

^② 具体内容可以见于这一时期工党的选举纲领关于以色列社会建设思路的阐述，“The Platform for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s”，<https://en.idi.org.il/israeli-elections-and-parties/parties/labor-party-haavoda>, 2023-06-12.

^③ 犹太总工会创建于 1920 年，建立的初衷是组织起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劳动者，以进一步推动复国运动实践。复国运动期间，由于该组织及其下属机构为其成员提供工作机会和生活支持，它事实上成为了帮助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安身立命的关键组织。以色列建国后，犹太总工会更名为以色列总工会，并凭借其覆盖就业、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继续在工党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See Anita Shapira,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22-124; Abraham Doron, “The Labor Movement and Welfare Policy in Israel, 1948-1977”, *Israel Affairs*, Vol. 24, No. 1, 2018, pp. 26-44.

以正义性的分配与再分配。集体主义源自复国运动中犹太劳工及移民先驱们团结合作攻坚克难的集体精神，主张作为个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紧密联系的集体并为之全力奉献，以促进集体共同目标与个体价值及利益的实现。^①工党希望藉由培育和宣扬集体主义，塑造以色列民众的国民精神，强化广大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国民责任感，同时增进其关于工党治理模式及成就的了解。^②强力政府的理念继承自建设性社会主义，主张政府需要具备强大能力以实现并维护国家利益。比如，政府需要有能力来引导国民经济运行，因为“以色列和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在特殊情况下，市场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才能有效运转”。^③不过，工党也明确表示政府的“强力”并非绝对，而是以有效服务民众为标准，因此它也一再主张“要精简行政机制，简化官僚程序，改善政府对民众的服务，促进市场发展”。^④

由此不难看出，在左翼价值观阶段，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以及左翼理念的理解和运用愈发趋向工具化、议题化，特别是将社会主义仅抽象为社会平等和正义两项价值元素，而不再有涵盖其内涵、目标及实践途径的系统化理解。这样过度简化以致偏于局限的社会主义观，导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关联更趋微弱，原本对于社会主义的有限依循和实践也基本消失，致使该学说的左翼色彩不及以往。

（三）社会民主主义阶段（2009 年以来）

20 世纪 90 年代，工党开始强调自己的社会民主党身份。^⑤在此背景下，当工党的政坛地位随阿克萨群众起义（即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而屡

① See Nir Kedar, “Ben - Gurion’s Mamlakhtiyut: Etym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oots”, *Israel Studies*, Vol. 7, No. 3, 2002, pp. 117 - 133; Gil Tory, *The Zionist Ideas: Visions for the Jewish Homeland - Then, Now, Tomorrow*,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pp. 49 - 54.

② See Nir Kedar, “A Civilian Commander in Chief: Ben - Gurion’s Mamlakhtiyut, the Army and the Law”, *Israel Affairs*, Vol. 14, No. 2, 2008, pp. 202 - 217; Adi Sherzer, “The Jewish Past and the Birth of the Israeli Nation State: the Case of Ben - Gurion’s Independence Day Speech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7, No. 2, 2021, pp. 310 - 326.

③ Israeli Labor Party, “The Platform for 1992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 <https://en.idi.org.il/media/6676/%D7%A2%D7%91%D7%95%D7%93%D7%94-13.pdf>, 2023 - 06 - 26.

④ Israeli Labor Party, “The Platform for 1984, 1988, 1992, 1996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 <https://en.idi.org.il/israeli-elections-and-parties/parties/alignment>, 2023 - 06 - 25.

⑤ See Israeli Labor Party, “The Platform for 1999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 <http://educ.jmu.edu/~vannorwc/assets/ghist%20102-150/pages/arabisraeli/labor.html>, 2023 - 06 - 23.

创新低^①时，工党于 2009 年通过新党章，表示将在“遵循《以色列独立宣言》原则的基础上，以 1968 年《党章》的精神、工人运动的价值观、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为指导，促进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民族民主国家以色列的发展和繁荣”^②，明确把社会民主主义增立为指导思想。

在现阶段，工党在全盘吸收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基础上^③，直接将其理念和观点套用到以色列社会及议题中，并由此形成相关政策。这样，当前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不再寻求制度替代，仅仅旨在改善和优化其所处的以色列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接受甚至吸纳了一部分右翼理念，其意识形态光谱位置明显右移。具体来看，一则，工党把以色列的建设和发展目标同社会主义及其实践彻底脱钩，并对后者不再提及。另则，工党不再坚持强力政府、集体主义等理念，转而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彰显个体价值。同时，工党转而完全认同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手段来发展国民经济，并将确保经济活力视为国民经济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对社会平等与正义的坚持是现阶段工党意识形态中仅存的传统左翼元素。^④在此背景下，面对利库德集团主导的大规模市场化与私有化改革，工党表示“完全支持以色列的经济和市场朝向更具活力的方向发展”，但也认为“教育、医疗等具有福利性质的经济领域不能过度市场化”，并提出“为确保经济健康运行，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政府仍需承担一定责任，掌握必要权力”。^⑤

① 2000 年 9 月，利库德集团时任党首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强行“参观”被穆斯林视为“尊贵圣地”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由此引发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大规模流血冲突，即阿克萨群众起义。这场冲突持续近 5 年，造成双方将近 6 000 人丧生。身为以色列政坛中积极寻求通过“两国方案”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主要政党，工党的政坛地位深受此次冲突的强力冲击，由此进入了漫长的低谷徘徊期。

② Israeli Labor Party, “Labor Party’s Constitution (2009)”, https://www.labor.org.il/downloads/lpf_huka_050809.pdf, 2023-06-26.

③ 考虑到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两者的内涵都尤为丰富且保持动态，为避免歧义，这里使用了“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这一工党自己的表述。实际上，它指的就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最为直接和宏观的理解，亦即广大社会民主党普遍认同并秉持的思想观念。在本节中，“社会民主主义阶段”、第一段末尾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第三段第二句“社会民主主义本身”中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指代的都是这一意涵。

④ See Israeli Labor Party, “The Platform for 2022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 <https://havoda.org.il>, 2023-06-26.

⑤ See Israeli Labor Party, “The Platform for 2015, 2019 (April and September), 2020, 2021, 2022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 <https://en.idi.org.il/israeli-elections-and-parties/parties/labor-party>, 2023-06-25.

由上观之，伴随工党社会主义观的修正与改良，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理念依循和具体内容保持动态，呈现持续右倾演化，这主要源于工党就社会主义内涵、目标和实践路径的极具伸缩性的动态理解，并表征为该思潮左、右翼元素的此消彼长。首先，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直观表现为该思潮的左翼元素减少而右翼元素增多。左翼和右翼是政治学当中用以描述政治观念、区分意识形态立场的简明概念，大致拥有三重意涵：一是对政治变革的相反态度，左翼信仰进步，欢迎变革，右翼则抵制变革，寻求捍卫现状；二是对社会平等的不同认知，左翼主张推进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右翼则认为平等不可能或不可取；三是就经济和国家角色的不同理解，左翼支持干预和集体主义，右翼支持市场和个人主义。^① 在嬗变过程中，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左翼元素持续弱化减少，由最初强调要推动解放生产力、维护社会平等公正，并且尝试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追求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仅坚持公有制、强力政府、社会平等、集体主义等实践性的理念及价值，此后更是仅以保障基本福利、促进社会平等和正义作为左翼标识。与此同时，工党对于右翼理念及治理思路的认同逐步增强，并逐渐吸纳了其中的私有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弱化政府干预等元素。这样，左、右翼元素此消彼长使得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化嬗变凸显右倾特征。其次，该意识形态右倾嬗变的实质在于工党社会主义观的修正与改良。从社会主义学说分野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演化的视角看，工党社会主义观的修正和改良指工党在批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知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内涵越来越采取简化、片面理解，而且在此过程中，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

^① 需要指出，在不同的国家，左、右翼的具体意涵并非完全相同。就以以色列而言，左、右翼除了上述基本意涵外，还包含另外两重内容：一是关于处理犹太—阿拉伯民族关系的思考。左翼对于犹太—阿拉伯关系相对积极、包容，在处理同对方的分歧和矛盾上，倾向于首先采取政治和外交途径。右翼的认知则偏向保守，主张以强硬手段处理纷争，强调犹太民族利益优先。二是关于教俗关系的思考。左翼坚持政治世俗化，尽管也把犹太宗教力量视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同其激进的政治理念及主张保持距离。右翼则更亲近犹太宗教力量，在政治理念上多有共识，而且还援引其作为政策和观点背书。不过，由于工党对相关议题的思考并未体现在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中，而是集中在诸如“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等其他意识形态理念中。因此，界定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变迁，仍应以左、右翼的基本意涵作为衡量标准。See Andrew Heywood, *Key Concepts i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19-120; 崔守军、吴诗尧：《以色列利库德党的意识形态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第122~132页；Avi Shilon,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Wing in Israel: Yossi Beili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eace Progress*, London: I. B. Tauris, 2020, pp. 58-60.

转而寻求以社会主义元素来帮助以色列的资本主义制度规避其缺陷，实现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论，修正与改良一方面体现为工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认知变化，即从寻求推动社会主义的践行和兑现，调整为选择性地使用社会主义的少部分理念及价值元素，来改进现行制度。另一方面，这体现为工党追求和实践“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即完全否定并尝试解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制度外的实践途径，而强调只能诉诸生产建设、议会斗争、政策推行等制度内途径。与这些变化相对应，工党调整了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目标追求和实践思路，从而使得该思潮呈现右倾嬗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从社会主义分野和演化的角度以更宏阔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这一思潮与社会民主主义本身的嬗变轨迹几乎保持同频：两者的发展阶段高度重合^①，而且各发展阶段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极为近似，彼此呼应（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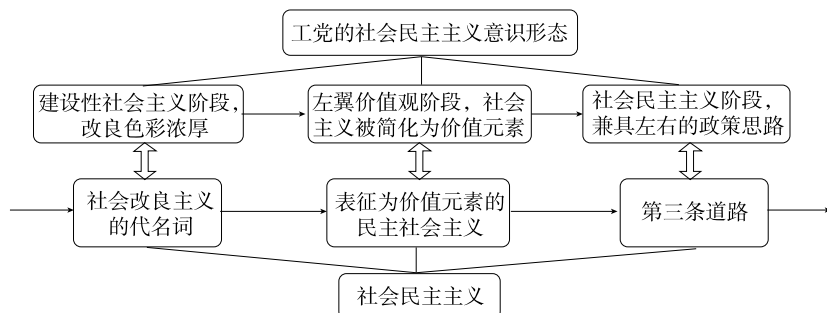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主义分野演化视角下两支学说的嬗变轨迹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右倾嬗变的原因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持续右倾嬗变，源于其实践环境、

^① “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即德语词汇“Sozialdemokratie”）最早出现于 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主要是指德、法等国激进民主派中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集团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陆续成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自此以降，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嬗变进程大致经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社会改良主义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面”“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第三条道路”等阶段。其中，后 3 个阶段与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 3 个发展阶段形成重合、呼应。参见王学东、曹军：《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 年第 3 期，第 46～51 页；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渊源和演变》，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 年第 5 期，第 15～20 页；林建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当代走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 年第 4 期，第 90～99 页。

所属政党以及理论特质三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

(一) 实践环境变迁的现实驱动

在国家建立和建设的过程中，以色列的发展阶段与社会环境发生巨变，驱使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相应演化。

一方面，以色列从建国、立国再到治国的发展阶段转变，使该国政治力量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随之变化。在此过程中，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动态，以确保其对实践环境的解析和指导效力。在复国运动期间，面对在伊休夫（Yishuv）建立现代犹太国家这一根本任务^①，工党主要运用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深入分析犹太人问题，从而为复国运动提供指导。其中，复国运动早期，既有的运用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来剖析犹太人问题、动员犹太无产阶级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学说，既为工党提供了思想借鉴与启发，也成为其思辨批判的重要对象，由此促使工党形成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开始领导复国运动后，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以建设性社会主义为基本内涵，既区别于既有学说的斗争、革命色彩，也降低了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强调与追求，由此将其理论关切和实践重心转移到促进伊休夫的生产建设与社会发展上，加快使当地形成既成政治事实，推动复国运动进程。

建国初期，以色列面临同邻国作战、吸纳移民两方面严峻挑战，国家发展进入立国阶段。其中，以数次中东战争为典型，中东地区围绕或涉及以色列频频爆发冲突乃至战争，致使新兴犹太国家直面存亡压力。^②与此同时，由于需要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有效吸纳短时期内涌入的大批犹太移民，新兴犹太国家所面临的发展与治理任务也颇为艰巨。^③对此，工党在这一时期

^① “伊休夫”是希伯来语中意为“定居点”，在复国运动语境中，它被用以指代以色列建国之前巴勒斯坦地区逐渐具备准国家形态的犹太社会。伊休夫有“老伊休夫”（Old Yishuv）和“新伊休夫”（New Yishuv）之别。前者主要指形成于“第一次回归潮”（First Aliyah, 1882~1903年间）之前、依托犹太教活动（而非复国理念）所发展起来的小规模的犹太定居点，主要分布在耶路撒冷、采法特（Safed）、太巴列（Tiberias）、希伯伦（Hebron）等市镇及其周围。后者则泛指复国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社区。See Eliezer Ben - Rafael and Stephen Sharot, *Ethnicity, Religion and Class in Israeli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5 - 26; Muhammad Suwae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alilee Bedouins and the Yishuv During the 1948 War”, *Israel Affairs*, Vol. 26, No. 2, 2020, pp. 213 - 223.

^② Ahron Bregman, *Israel's Wars: A History Since 1947*,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27 - 35.

^③ 据统计，以色列建国时有犹太人口约71万，而仅在1948年至1952年间，涌入该国的犹太移民便超过了72万。Jewish Virtual Library, “Total Immigration to Israel by Year (1948 - Present)”,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total-immigration-to-israel-by-year>, 2023-06-22.

继续依循建设性社会主义，旨在通过大力促进生产建设来迅速开启工业化、发展关键产业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尽快增强关键实力，以期实现国家的存续。

以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为标志，以色列真正站稳脚跟，从立国转入治国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也相应转变为聚焦发展和治理。在此背景下，能否为工党的政策思路提供有益指导，从而增益于工党的政坛表现，成为工党针对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考量。因此，工党先是将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调整为左翼价值观。然而，基于左翼价值观的治理政策日渐失灵，特别是经济干预导致以色列通货膨胀积重难返（见图 2）、社会福利供给不均而且质量偏低，致使工党备受指责。^① 面对选票压力和社会批评，工党最终选择再次调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以期重新为治理逻辑和政策思路提供有益指导，提升自身的政坛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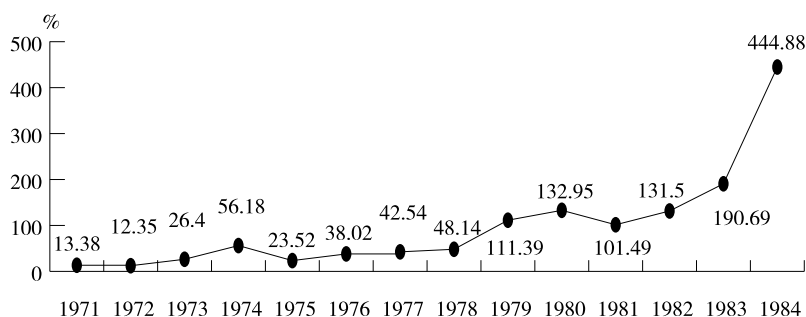


图 2 1971 ~ 1984 年以色列通货膨胀率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全球通货膨胀数据库（World Inflation Data）数据制作。

另一方面，面对以色列社会愈发右倾，工党不得不就意识形态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实践环境。首先，以色列建国后短期内涌入的海量移民改变了以色列的选民结构，对当地延续自复国运动时期、以工党及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和主流价值形成冲击。据统计，建国前 30 年间，超过 161 万犹太移民涌入以色列，占当时该国总人口的 44.3%。^② 这些新移民大多未

^① Ofer Arian, “A Welfare State without a Welfare Policy: The Case of Israel”, *Israel Affairs*, Vol. 24, No. 3, 2018, pp. 369–394.

^② Jewish Virtual Library, “Total Immigration to Israel by Year (1948 – Present)”,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total-immigration-to-israel-by-year>, 2022-05-13.

曾亲历复国运动，难以完全适应工党的思想观念和治理举措。而随着以色列的存续压力减轻，新移民对于工党及其意识形态和治理实践的认同更趋弱化，却愈加支持主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个体价值的右翼政党（见表1）。这种理念亲疏变化，加上以移民为基础的“新国民”数量大增，而左翼支持者的国民人口占比下滑，使得亲右翼民众及其价值倡导逐渐发展为以色列社会主流。^①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数据就显示，自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相关民意调查以来，认为自己属于“右翼”的以色列选民比率稳定上升，由39%增长为2022年的62%。相比之下，自我界定为“左翼”的选民比率则由高峰时期的36%跌落至当前的11%。^②

表1 第一届至第八届以色列议会选举利库德集团及其前身得票状况

时间	得票率 (%)	时间	得票率 (%)
1949年1月	11.5	1961年8月	13.8
1951年7月	6.6	1965年11月	21.3
1955年7月	12.6	1969年10月	21.7
1959年11月	13.5	1973年12月	30.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以色列议会网站（<https://main.knesset.gov.il/EN/About/History/Pages/Lobby.aspx>）数据整理制作。

其次，伴随政坛地位跃升，右翼政党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在选民基础显著拓展以及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等节点性事件的强力推动下^③，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右翼政党上升为以色列政坛主导力量。右翼政党执政期间，尝试依照自身理念和思路来改革由工党构建起的国家治理模式。随着右翼政党的政坛优势愈加牢固，其针对经济体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举措也更加强力，并最终实现了对以色列经济的自由主义改革。^④ 面对以色列社会主流群体、主导政党以及发展和治理模式的结构性的右倾演化，工党不得不作

① Udi Lebel, Moshe Fuksman-Sha'al and Eithan Orkibi, " 'Mahapach!': The Israeli 1977 Political Upheaval - Implications and Aftermath", *Israel Affairs*, Vol. 24, No. 6, 2018, pp. 939-943.

② Carrie Keller-Lynn, "Jewish Israeli Voters Have Moved Significantly Rightward in Recent Years, Data Shows", *The Times of Israel*, August 29, 2022.

③ Yehhuda Ben Meir, Olena Bagno-Moldavsky, "The Second Intifada and Israeli Public Opinion",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3, No. 3, 2010, pp. 71-83.

④ Daniel Ma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the Neoliberal Era: What Changed? What Didn't?", in Asa Maron, Michael Shalev eds., *Neoliberalism as a State Project: Chang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46-49.

出适应性调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因此愈加右倾。

（二）工党的政党类型特征使然

从所属政党的角度看，相较于革命型政党，身为选举型政党而且在组建初期便赢得复国运动和伊休夫领导权的工党本就缺乏系统性重塑意识形态的动力。而随着政坛地位的波动、滑落，为迎合主流选民偏好，工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愈发束手束脚，缺乏自主性。这样，受制于所属政党类型的意识形态建设逻辑，右倾嬗变某种程度上实则是工党意识形态演化的可预期结果。

对身为选举型政党的工党而言，政党意识形态实际上并非需要坚信笃行的信仰与道路，而更多是作为服务选战需要、增益政坛表现的工具。因此，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愈渐展现出所谓的灵活性。其中，成为代表议会第一大党后，出于巩固政坛优势从而持续领导复国运动的现实考量，工党坚定地推崇更加温和、聚焦促进伊休夫发展的建设性社会主义，以此来争取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在此之后，面对以色列政局“变天”和阿克萨群众起义之后的政坛滑铁卢，工党又先后调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寻求藉此重获选民青睐，在政坛止颓回稳。^①

进而观之，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嬗变趋向同工党所属的政党类型有着更深层的逻辑关联。其一，看重选票优势的工党更需要充分顾及多数选民偏好，这意味工党的意识形态需更为温和、包容，更加贴近以色列的社会现实和主流预期。而考虑到该国社会逐渐右倾，工党的政坛地位又明显滑落，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迎合社会走势和选民偏好，工党扭转政坛颓势成为必然选项。其二，政党意识形态的选举工具化致使意识形态之于工党的重要性下降，削弱了工党对其意识形态进行实质性理论创新的动力，导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去理论化而愈发议题化、政策化，由原有理论内涵所表征的左翼色彩大幅消散。在这两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嬗变进路越来越呈现为某种“被动右倾螺旋”：由于无法取得理论突破，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思路难以有效吸引选民。鉴此，为了争取更多选票，工党只得迎合选民偏好、放弃意识形态建设的自主性而右倾嬗变，进而

^① See Neil Rogachevsky, “The Not – So – Strange Death of Israel’s Labor Party”, *American Affairs*, Vol. 4, No. 2, 2020, pp. 168 – 181.

导致工党的意识形态距离理论突破更加遥远。这一逻辑得到了事实的支撑。自被尊为以色列“建国一代”（The Founding Generation）的党内元老以降^①，工党领导层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意愿呈现代际递减，特别是近年来，频繁更替的工党领袖越来越疲于追逐议题热点，罕有超越政策设计层面的理论思考。^②与此相对应，在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嬗变过程中，工党越发缺乏充分结合以色列现实的系统性理论思考，而一味通过简化、删减既有的理论内涵来使该学说适应社会、吸引选民，最终导致其理念传统消失殆尽，左翼色彩愈发黯淡。

（三）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特质推动

作为中东地区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社会民主主义修正和改良的理论特质早已从理论维度给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右倾动力。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立足，源于它认可并且遵循资本主义制度，并愿意为此而大幅放弃和修正自身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目标。^③这样的理论特质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中突出表现为，面对竞逐选票这一现实需要，这些政党往往习惯于在指导思想“灵活调整”，以趋近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迎合选民偏好。因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演化呈现出放弃以斗争和革命作为实践途径、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摒弃社会主义目标的轨迹和特点。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嬗变逻辑同样建立在这一理论特质之上。亦即，在伊休夫和以色列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工党根据现实需要，持续地修正和改良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工党创建者之一的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 Gurion）对此早有暗示，“犹太劳工所参与的复国运动具有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属性。其中，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坚持使得复国运动能够成行并且持续，而复国主义则构成运动的主要目标和主导旋律。”^④由此，伴随实践环境演变和政坛地位起伏，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倾。值得一提的是，

① Anita Shapira,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41.

② Ilyssa Tuttleman, “The Crumbling Israeli Left - Wing and Netanyahu’s Power”,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May 31, 2018.

③ 林德山：《世纪的沉浮：欧洲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演变的逻辑与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第52~59页。

④ David Ben - Gurion, “Socialist Zionism”, in Brakhah Habas ed., *David Ben - Gurion’s Selections*, Baltimore: Labor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1948, p. 25.

即便考虑到固有的理论特质，近年来工党意识形态的右倾幅度仍显得较为夸张，以至于连社会党国际都直言，“对于工党这样一个富含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劳工传统的政党，却选择违背其最初价值与定位，我们深感遗憾”。^①

综上，以色列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改变，意味工党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作出相应调整，而该国社会大幅右倾，则迫使工党的意识形态与之协同演化，以适应新的实践环境。作为一个选举型政党，工党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自主性和动力偏弱，导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越发被现实政治需要所裹挟，而背离其初衷和基调。刻印在自身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属性之中的修正改良特质，使得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本就具有来自理论维度的嬗变动力，也塑造了其嬗变的基本趋向。

三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右倾嬗变的现实影响

纵观以色列的建国和发展历程，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工党用以指导政策思路、吸引选民支持的关键理论工具，其右倾嬗变深刻影响了以色列的政坛格局、社会面貌以及国家发展和治理模式。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曾一度使得工党能够连续主导政坛，但此后却难以再增益于工党的政坛表现，特别是近年来，该思潮的进一步右倾甚至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工党的边缘化困境。另一方面，持续的右倾嬗变造成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趋同于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这大幅冲击甚至消解了以色列社会中的左翼力量，并且变相助益于右翼政党及其政策实践，推动以色列社会更趋结构性右倾。

（一）影响工党的政坛表现和组织发展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对工党的政坛表现先后起到增益和愈发明显的阻抑作用，折射出这种嬗变对工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基础产生复杂性影响。

一方面，工党作为选举型政党，调适意识形态的基本动机即在于增益自

^① Noa Landau,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alition Blasts Israeli Labor for Joining Netanyahu’s Pro-Annexation Government”, *Haaretz*, May 16, 2020.

身政坛表现，但从以色列政局的变化来看，这番调适逐渐背离工党预期。具体而言，在建设性社会主义阶段，工党凭借该学说突出的实践效能和民众吸引力巩固并扩大了政坛优势，不仅稳居伊休夫代表议会第一大党，还在以色列建国后接连赢得头 8 次议会大选，垄断政坛。^① 但是，转入左翼价值观阶段后，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并没能帮助遭遇政局“变天”的工党恢复政坛统治力。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的 6 次大选中，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的得票率往往非常接近，从而使这一时期以色列政坛在事实上形成了两极格局。^② 工党也由此从该国的主导政党退为主要政党。而当前，转入社会民主主义阶段的该学说不仅难以为工党在政坛止颓回稳提供帮助，从大选和组阁结果看，这一转变甚至还一定程度地加剧了工党的边缘化趋势（见表 2）。可见，在前期起到明显增益效果后，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越来越难以增益于该党的政坛表现。

表 2 21 世纪以来历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工党选情概览

时间	得票率 (%)	议会排名	是否进入内阁
2003 年 1 月	14.5	2	否
2006 年 3 月	15.1	2	是
2009 年 2 月	9.9	4	是
2013 年 1 月	11.4	3	否
2015 年 3 月	18.7	2	否
2019 年 4 月	4.4	6	未能组阁
2019 年 9 月	4.8	8	未能组阁
2020 年 3 月	5.8	6	是
2021 年 3 月	6.1	6	是
2022 年 11 月	3.7	4	否

说明：2019~2021 年期间，由于获胜政党无法成功组阁等原因，根据以色列基本法的规定，该国议会数次重新举行大选。然而，随着 2021 年大选后组成的政府运行仅一年便宣告解散，以色列迎来了三年半之内的第 5 次大选。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以色列议会网站数据（<https://main.knesset.gov.il/EN/About/History/Pages/Lobby.aspx>）整理制作而成。

^① Knesset, “History”, <https://main.knesset.gov.il/EN/About/History/Pages/Lobby.aspx>, 2023-05-23.

^② 在这 6 次大选中，工党的得票率依次是 36.6%、34.9%、30.0%、34.7%、27.5% 和 20.2%；利库德集团的得票率则依次为 37.1%、31.9%、31.1%、24.9%、25.8% 和 14.1%。See Knesset, “History”, <https://main.knesset.gov.il/EN/About/History/Pages/Lobby.aspx>, 2023-06-26.

既然右倾嬗变已愈发难以增益政坛表现，为什么工党仍旧以这一思路来调试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本文认为，其一，基于修正、批判相关左翼犹太复国主义学说而形成的建设性社会主义给工党的政坛表现带来显著增益，激励工党的意识形态调整思路形成了对于右倾嬗变的路径依赖，即相信能够通过抑制、重构和摒弃自身意识形态原有的左翼元素，来换取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其二，面对政坛滑落加剧和选民结构右倾，越来越急于扭转颓势的工党不得不就意识形态作出进一步妥协，试图以此重获多数选民青睐。因此，概言之，愈发高企的现实政治需要迫使工党在意识形态调整过程中一再显现右倾惯性。而进一步看，近年来，工党着重根据执政党的“失分项”来打造政策关切和选纲重点，并且异常频繁地更换背景各异、身份多元的党首^①，这些举措实则生动体现出该党竭力遏止政坛颓势的根本愿望。

透过工党的政坛兴衰可以发现，伴随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倾，工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基础大幅缩减。建国后连续执政期间，工党党员人数曾快速上涨，一度占据了以色列政党成员总数的近 50%，是名副其实的该国第一大党。^② 然而，2021 年工党仅有党员约 3.7 万人，规模甚至远逊于 1950 年水平（6.7 万余人）。^③ 组织规模萎缩的背后是选民基础严重流失。尤其是近年来，工党越来越难以获得选民青睐。例如，在 2021 年以色列大选中，约有 444 万选民参与了投票，而独立参选的工党只获得了不到 27 万张选票。^④ 在 2022 年大选中，工党同样独立参选，约 3.7% 的得票率仅略微高于议会门

① 自 2000 年以来，利库德集团共产生了阿里埃勒·沙龙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两届党首。而同一时期，工党共产生了 11 届党首，其中任期最长者不过 5 年，最短者仅 1 年。在这些频频变换的繁多党首中，有老一代党员西蒙·佩雷斯，有政治强人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有名门之后伊萨克·赫尔佐格（Issac Herzog），有资深议员阿米尔·佩雷茨（Amir Peretz），有女将谢丽·亚奇莫维奇（Shelly Yachimovich）及梅拉夫·米凯莉（Merav Michaeli），还有弃商从政的政坛新人阿维·加贝（Avi Gabbay）等，不一而足。现任工党党首是自 2021 年 1 月起开始任职的梅拉夫·米凯莉。这些党首多元化的身份背景（不同的性别、社群、阶层、犹太族裔、职业履历等）和各不相同又与时俱进的议题侧重（打击贪腐、提振经济、增强福利供应、关注环保气变、重视女性力量、支持彩虹族群等），以及他们对工党意识形态传统的差异化依循，实则生动表明工党急于摆脱困境的迫切渴望和激进尝试：试图藉由党首调整、扩大议题关注来吸引更多支持，从而有效补充本党票仓。

② Luke Akehurst, “Has Merav Michaeli rescued Israeli Labor Party?”, *Labour List*, February 17, 2021.

③ Pinchas Rimón, *The Story of Mapai: Israel's Labor Party*, New York: Shulsing Bros Publishing, 1956, p. 16; Knesset, “History”, <https://main.knesset.gov.il/EN/About/History/Pages/Lobby.aspx>, 2023 - 06 - 22.

④ Knesset, “History”.

槛(3.25%)，刷新了其得票率低值。^① 作为对比，巅峰时期的工党可以从132万余名选民中获得超过63万人支持，得票率高达46.2%。^②

诚然，工党组织力量锐减、政坛地位衰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右倾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促推作用。对意识形态和治理思路的认同是以色列民众选择支持工党的前提条件。然而，工党在意识形态上大幅右倾，其治理思路逐渐趋同于竞争对手，导致民众难以形成和保持认同。其中，工党原有支持者们面对这番右倾嬗变无所适从、进退失据，因为认可嬗变意味着背弃自身的信仰和习惯，而不认可嬗变则表示不再认同工党的理念和思路，也就不再是工党的支持者。而在以色列其他民众看来，意识形态的大幅右倾现象从事实上表明工党的传统学说及其实践方式或许已难以适应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因此，这些民众更加缺乏理由和动力来支持工党。有以色列媒体就直言，“如果这就是工党的政策思路，那不如直接把票投给利库德集团。”^③ 换言之，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右倾，导致原有的支持者们信仰动摇，却又无法有效吸引到新的支持者，致使工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基础难以恢复。在此情况下，工党遭遇政坛边缘化并不令人意外。

(二) 助推以色列右翼政党的政坛崛起和政策实践

在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持续右倾，使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思路愈发趋近于右翼政党。这间接推动了右翼政党的政坛崛起，更对其自由化改革、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实践形成助益。

首先，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右倾削弱了工党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间接强化了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优势，有利于后者提高政坛地位。在其意识形态右倾嬗变的过程中，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修正、放弃乃至否定自身的理论内涵和理念因素，而愈发趋近于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这种嬗变一方面对工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事实上的祛魅甚至解构效果，导致其理论解析力和实践指导力难以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它还变相印证了右翼

^① Knesset, “History”, <https://main.knesset.gov.il/EN/About/History/Pages/Lobby.aspx>, 2023 - 06 - 25.

^② Ibid.

^③ Aviad Kleinberg, “If This is The Left’s Leader, Why Not Just Vote for The Right?”, *Ynet News*, October 20, 2017.

政党的学说及理念确实更加契合于当前的以色列社会，强化了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优势。由此，双方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此消彼长，使得以色列民众又多了一个选择右翼政党的理由。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倾，右翼政党的政坛优势愈发牢固。特别是近年来，利库德集团、前进党（Kadima）、统一右翼联盟（Yamina）等右翼政党接连执政，而工党与这些执政党的得票率差距却明显扩大，在 2022 年以色列大选中，工党得票率甚至仅为胜选的利库德集团的 15.8%。^①

其次，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右倾促使工党认同并借鉴了右翼政党的某些治理观念和政策思路，对右翼政党在经济和民生领域的相关实践形成助益。随着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右倾嬗变，近年来，工党越来越赞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匹配、重视个体需要等治理路径及理念，并将其作为政策基础。同时，对于右翼政党基于这些理念的政策及实践，工党的态度也更加开放、积极，使得右翼政党的政策实践环境更加宽松有利。例如，在 2022 年议会大选的竞选纲领中，工党强调“我们相信国民经济应该将人视为目标而非工具……相信劳动力市场应该保障健康生活和有价值的工作相平衡，相信国民经济应该帮助市场主体茁壮成长，也相信劳动者权益和社会正义”^②，由此不难看出其中对于右翼理念的借鉴和化用。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环境，利库德集团能够在近年连续执政的过程中，大力推进公有制企业私有化、打击垄断、增强市场竞争、限制政府预算赤字、短期冻结政府开支、缩小公共部门规模、鼓励民众就业、降低企业和个人税率、放松货币兑换管控、拆分商业银行长期储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最终完成对以色列国民经济的自由主义改革。^③

① Knesset, “History”.

② Israeli Labor Party, “The Platform for 2022 Israeli Legislative Election”, <https://havoda.org.il>, 2023-06-26.

③ 以色列经济的自由主义改革始于 1985 年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联合执政时出台的“经济稳定计划”（1985 Israel Economic Stabilization Plan），其初衷是通过自由主义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举措，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当时，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债务高企、银行资本危机等因素叠加，以色列经济遭遇严重滞胀，通货膨胀率一度直逼 450%。以色列经济脱困后，改革步幅明显放缓。待利库德集团于 2001 年上台并逐渐主导政坛，特别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任财政部长以及此后连任总理期间，强力改革再次进入政府的中心议程，且深度和力度更胜以往。Guy Ben-Porat, “Netanyahu’s Second Coming: A Neoconservative Policy Paradigm?”, *Israel Studies*, Vol. 10, No. 3, 2005, pp. 225-245; Joseph Zeira, *The Israeli Economy: A Story of Success and Co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01, 271-282.

再次，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幅右倾从整体上冲击并弱化了其思想学说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致使工党难以从思想理念层面对右翼政党形成有效的抗衡和制约。而正是受此因素影响，以色列右翼政党顺利实施了包括新颁布基本法、推动去阿拉伯化、扩建西岸定居点等举措，有条不紊地将其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强硬政策路线付诸实践。^① 该路线及相关举措导致巴勒斯坦的土地不断遭到蚕食，民众生存压力激增，给巴以之间再度爆发剧烈冲突深埋下隐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越境突袭以色列，造成以方大量人员伤亡。以色列则报之以“铁剑”行动，以高强度空袭辅之以地面进攻，将加沙地带“拦腰截断”，并导致加沙地区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三）削弱以色列社会中的左翼力量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对以色列左翼政党、以色列总工会、基布兹（Kibbutz）等主要左翼组织都造成冲击^②，导致该国左翼力量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更趋下跌。

一方面，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弱化了以色列左翼政党间的理念和政策共识，疏远了其原本的盟友关系，致使左翼政党的影响力整体滑落。在凸显碎片化的以色列政坛，单个政党往往需要借助执政联盟来赢取政权。^③ 因此，稳定的政治盟友显然更加有利于政权的获得和护持。梳理工党的执政经历可以发现，工党掌权以及主导以色列政坛，离不开劳工联盟党（Ahdut HaAvoda）、联合工人党（United Workers Party）、梅雷兹党（Meretz）等以色列其他左翼政党在议会选战及组阁过程中的协作与支持。这些左翼政党之所以选择支持工党，一则在于彼此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思路具有相似性、

^① Reham Owda, “How Israeli Settlements Impede the Two - State Solu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7, 2023; Isabel Kershner, “Why Israel is Pushing to Expand West Bank Settlement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23.

^② 产生于复国运动中的基布兹被认为是以色列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其组织和运转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普遍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要从事农业和简单的工业生产。基布兹成员们的劳动所得全部归集体所有，用以维持基布兹运行、保障公共福利和促进成员发展。在以色列建国与立国的过程中，散布各地、规模不一的基布兹作为粮食和兵源的重要供应方，在国民安全和国民经济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参见高放：《以色列“基布兹”的奇迹》，第123~126页；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pp. 314 - 338.

^③ 以色列议会有120个议席，根据该国基本法规定，政党或政党组织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60席方可执政。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尚没有任何一支政党能够单独达到61席的执政要求。因此，不同政党组团参选和组队执政成为以色列政治的基本常态。

共通性，尤其是其社会主义认知以及左翼价值取向同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关切相近，论域高度重合，实践思路上也能够积极互动；二则在于上台执政的现实考量。得益于工党与左翼政党所形成的政治联盟，左翼政治力量曾经实现了对以色列政坛的长期掌控。

但随着工党在意识形态上愈发右倾，该党与其他左翼政党就理念和思路的矛盾增多而共识减少。例如，当工党已经对社会主义采取修正改良式认知时，联合工人党仍然坚持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致使双方观念极具张力。^①又如，刊发在以色列左翼大报《国土报》的文章强烈建议梅雷兹党不要与工党结盟参选 2022 年以色列大选，其理由是担心“两党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被掩盖”。^②诸如此类观念纷争损耗了盟友关系，成为导致左翼政党联盟解体的意识形态动因。早在 1984 年大选中，意识形态分歧消解左翼联盟的可能性便已露出端倪：联合工人党因不满工党同利库德集团组阁，退出了与工党组成的竞选同盟。^③目前，曾经组队参选和执政的左翼政党联盟已难寻踪迹，各党转而单打独斗或者另寻盟友。^④但从效果来看，即使是工党之外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梅雷兹党，不仅议会排名从未超过陷于低谷的工党，也远非执政联盟常客，难以真正产生有效的政治影响。^⑤由此可以看出，工党意识形态右倾的消极影响实际上也殃及以色列其他左翼政党的政坛地位，进而致使左翼政治力量不再居于该国政坛主流。

另一方面，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消解了以色列左翼社会组织的既有功能和存续意义，导致其大幅衰落。在工党以往的治理实践中，以色列总工会、基布兹等左翼社会组织是支持以色列经济发展与福利供给的重要单元。其中，以色列总工会因为拥有基础建设公司（Solel Boneh）、工人

^① Tal Elmaliach, “The Decline of the Israeli Labor Movement: Mapam as a Test Case, 1954 - 1977”,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22, No. 3, 2017, pp. 68 - 97.

^② Gedion Levy, “Meretz Must Not Merge with Occupation - Blind Labor”, *Haaretz*, September 1, 2022.

^③ Ya'ir Tsaban and John P. Egan, “Ya'ir Tsaban: A Mapam Peac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4, No. 4, 1985, pp. 92 - 105.

^④ See Luke Akehurst, “Labor and Meretz - A Merger Borne out of Blind Electoral Panic”, *Labour List*, January 14, 2020; Alan Pinkas, “How and Why Israelis Stopped Voting for the Left”, *Haaretz*, August 24, 2022.

^⑤ 2022 年大选中，梅雷兹党因得票率（3.16%）未超过选举门槛，没能进入议会。该党近年政坛表现，see Knesset, “History”。

银行（Worker's Bank/Bank Hapoalim）、以星航运集团（ZIM）等诸多行业龙头级公有制企业，以及旗下众多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等机构，事实上已成为工党落实福利政策、干预经济的重要抓手。^① 基布兹则因其在以色列农业总产量中占比近半^②，被公认为是该国农业支柱，对以色列的民生、经济乃至安全都至关重要。

然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致使工党的治理观念和实践思路巨变，导致左翼社会组织的存续和发展深陷困境。就总工会而言，工党弱化经济干预、精简福利供应的治理思路转向，意味着总工会不再作为关键的治理抓手，其重要性和功能性不复以往。在这样的背景下，总工会的规模与实力显著削弱：成员由高峰时期的160余万人下降到目前约80万人，在以色列工薪人口中的占比由约85%降为19%；旗下的工人银行、以星航运集团等大型企业被彻底私有化；综合卫生服务也不再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医疗保障服务供应方。^③ 就基布兹而言，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倾，令工党彻底丧失了推动基布兹发展践行社会主义价值的意识形态动力。失去政策与财政支持的基布兹在运营和发展中面临严峻挑战，被迫转型自救。据统计，在以色列270余个基布兹中，已有188个放弃了意识形态传统和原有的组织及运行模式，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平等主义转向了私有制和差额工资制度。^④ 时至今日，转型后的基布兹虽然大多凭借新的发展路径逐渐度过危机^⑤，但其左翼组织的属性也大幅淡化，与此前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已大相径庭。

① See Colin Sc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70–76; Anita Shapira, *Israel: A History*, pp. 119–152, 208–220.

②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有些研究误将同样作为农业垦殖组织但并不遵循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原则的莫沙夫（Moshav）也一并视为基布兹，导致基布兹在以色列农业总产量中的占比被误统计为80%。事实上，刨除误算部分后，实际数据应该是40%强。Ministry of Israel Foreign Affairs, “Kibbutz and Moshav”,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general/kibbutz-and-moshav>, 2023-06-22.

③ Histadrut, “History of Histadrut”, <https://www.histadrut.org.il/eng/History>, 2023-06-23. Bank of Israel, “Economic Indicators: Labor Force and Demographics”, <https://www.boi.org.il/en/DataAndStatistics/Pages/Indicators.aspx?Level=2&IndicatorId=1&Sid=5>, 2023-06-25.

④ Eli Ashkenazi, “After 100 Years, the Kibbutz Movemen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Haaretz*, January 7, 2010.

⑤ See Raymond Russell, Robert Henneman, and Shlomo Getz, *The Renewal of the Kibbutz: From Reform to Transformat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82; Yaffa Moskovich, “Loss of Democracy in a Cooperative Kibbutz Industry: Ethical Dilemmas – An Israeli Case Study”, pp. 909–929.

四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实践环境、所属政党以及理论属性等层面因素的共同驱动，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倾嬗变，这种变化体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助推以色列建国与立国的关键政治思潮，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对该国的政坛格局、社会面貌以及发展和治理模式都产生了塑造性的深刻影响，是造成工党政坛沉浮和以色列社会结构性右倾的意识形态要素。当前，随着工党愈发重视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思潮及其右倾嬗变将对工党的政坛表现和以色列左翼力量的发展态势产生更为突出和复杂的影响。

放眼全球，右倾嬗变并非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所独有，而是广大社会民主党在思想演化、理念流变过程中的共有特征，折射出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建设所面临的相似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清晰明确且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实践目标，而原有的实践模式和政策思路又趋于失灵，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在理论建设中失去方向，特别是“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实则表明社会民主党尚未真正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新模式，而是试图通过进一步地自由主义化，来增强自身意识形态的现实适应性，提高其理论实践效能。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实践目标之所以模糊不定，不可忽视的现实原因恰恰在于：这类政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反主流”的身份定位致使其丧失了理论建设的自主性。换言之，为了确保政坛地位，社会民主党在理念传承和理论探索中，只得接受资本主义社会主流价值和选民偏好的约束甚至被形塑。

视线转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携利库德集团在 2022 年 11 月大选中卷土重来，组建起“迄今为止最为右倾的一届以色列政府”^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工党不仅无缘内阁，还创下得票率新低，以致引发了“工党存亡难料”“以色列左翼已经崩溃”等声音。^②而回顾整个 2023 年，工党先是临阵退出由

^① Gwen Ackerman, “What to Know about Netanyahu’s Far – Right Government in Israel”,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7, 2023.

^② Haviv Rettig Gur, “The Israeli Left has Lost More than an Election”,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7, 2022; Nehemia Shtrasler, “Israel’s Labor Party is Responsible for Its Own Election”, *Haaretz*, October 31, 2022.

总统赫尔佐格组织的司法改革政治谈判^①，并深度卷入司法改革反对派阵营的权力纷争^②，随即又爆出党内高层就理念和路线存在严重分歧^③。在此之后，发生在2023年10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导致工党因坚持相对温和的巴勒斯坦政策思路而再度遭到以色列各界批判和苛责，甚至真正面临存亡危机。^④这一系列事态致使工党的公共形象严重受损，前景更加不容乐观。同时，这些事态也深刻表明，面对愈发极化、割裂、民粹化的以色列社会^⑤，急需获得选票的工党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更为被动，其传统的理念、价值及学说将面临更多冲击与抉择。可以预见的是，不论其嬗变趋向如何，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要想走出低谷、重焕光彩，至少面临重新理解以色列社会、理论创新与再本土化、平衡现实政治需要等多重任务和挑战。这将是对以色列立国政党的智慧、经验和魄力的全方位考验。不过，工党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第四次中东战争与阿克萨群众起义之后以色列政坛格局出现颠覆性巨变的历史经验表明，每当以色列遭遇像本轮巴以冲突这种具有突发性、大规模、高烈度特点的重大冲突后，也会出现执政党与反对党政坛地位翻转的情况。从这个角度看，本轮巴以冲突过后，包括左翼政党在内的以色列反对党将迎来提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机遇。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Eliav Breuer, “Judicial Reforms Negotiations Resume Monday at President’s Residence”, *The Jerusalem Post*, April 16, 2023.

② Noa Shpigel, “Israeli Opposition Leaders Rally Behind Joint Candidate for Key Judicial Selection”, *Haaretz*, June 7, 2023.

③ Shalom Yerushalmi, “Labor MKs Seek to Replace Leader Michaeli, Claim Party’s Future Depend on it”,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17, 2023.

④ Louis Imbert, “The Israeli Left’s Extensional Crisis”, *Le Monde*, November 3, 2023; “‘Now isn’t the Time’: Israel’s Left Conflicted on Future after Hamas Attack”, *Al Jazeera*, November 10, 2023.

⑤ Michael Hauser Tov, “Issac Herzog Sworn in as Israel’s 11th President, Vows to Act Against ‘Baseless Hatred’”, *Haaretz*, July 7, 2021.